

晋祠圣母殿华带牌 “显灵昭济圣母”略考

□ 贾莉莉

悬挂在古建筑上的附属文物楹联匾额属于小木作艺术,是实用较强的艺术品,其沿用从秦朝到清代,贯穿整个封建社会,是古代制度文化、艺术文化和文字符号的综合性产物。它集书法、文学、石木雕篆彩画漆饰艺术技法于一身,与古代建筑相得益彰,并造就了内涵丰富的古代联匾文化。联匾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民俗民风等,起到了正史补史的作用,正所谓“以匾研史,可以佐证,以匾学书,可得笔髓”。联匾因其所特有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而成为我们研究民族文化发展的实物例证。

山西晋祠在北魏时已有祠堂、飞梁;北齐时则大起楼观、穿筑池塘;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乃至民国历代屡有扩建,成为集古建筑、石刻、雕塑、古树、名泉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这里保留有宋、元、明、清、民国古建筑近百座,素有“山西古代建筑宝库”之称。其建筑上悬挂保存有匾额 150 多块,材制分为木质、石、砖刻,形式分为横匾和竖匾(华带牌)。



图一 晋祠圣母殿

宋建圣母殿是现存祠区主要的殿堂,也是现存最古老的建筑(图一)。其背靠悬瓮山,前临晋水,宏伟壮观,建筑上悬挂有 20 块匾额 5 副楹联。其中前廊内明间上方悬挂的华带牌“显灵昭济圣母”,是现存祠区保存体量最大的一块牌匾。牌匾为长方形,木质,高 420 厘米、宽 300 厘米,匾文“显灵昭济圣母”六字,每字约大 100 厘米左右,文字均用阳刻贴金字,为颜体楷书(图二),牌匾无上下款题和钐印。对于该牌匾的制作年代问题,既无题记作证,又无旁证借鉴,而晋祠的介绍性的书籍中称为宋代原物。笔者近来对晋祠楹联匾额略有初探,就牌匾的时代问题拟从以下几方面略加考证。

一、圣母殿与圣母邑姜

华带牌“显灵昭济圣母”究竟产生于什么时代?首先,我们对牌匾所依附的建筑圣母殿和所



图二 华带牌“显灵昭济圣母”



图三 圣母邑姜像

涉及的人物圣母谈起。

晋祠圣母殿的创建年代,据宋赵昌言撰《新修晋祠碑铭并序》碑文记载^[1]和有关资料显示,最初创建于宋太平兴国九年(984年),崇宁元年(1102年)重修,是为奉祀西周时期周成王和晋王唐叔虞的母亲而修建的祠堂。关于圣母殿内圣母像,《宋会要辑稿》载:“平晋县有圣母祠,神宗熙宁十年封昭济圣母,……徽宗元年十月加封‘显灵昭济圣母’。”^[2]从记载中,我们看出圣母因封“昭济”始当水神,后来历代封赐号,都按水神奉祀,如宋政和元年(1111年)加封“显灵昭济圣母”;明洪武二年(1369年)又加封“广惠显灵昭济圣母”^[3];清同治六年(1867年)又加封之“沛泽”二字;清光绪五年(1879年)又奏封“翊化”二字,最终圣母的封号加至12个字“广惠显灵昭济沛泽翊化圣母”,皆因“祷雨有应”而封,而从未以唐叔虞母亲的名义而加封。说明了宋、元、明、清以来,圣母殿一直以来当作晋源神祠,因遇年旱缺水,祷雨灵应,颇受崇仰,请加封号,尊称圣母。

康熙年间考据学家阎若璩^[4]从草丛中搜出宋宣和五年(1123年)残碑,乃为姜仲谦《晋祠谢雨文》碑^[5],其首云“惟圣母之发祥兮,肇晋宝而开基;王有文之在手兮,其神灵之可知。”他通过对“圣母肇基”和“唐叔有文在手”碑文考证,又参照



图四 铁人胸前铭文

《史记·晋世家》,其结论在他所著《四书释地》一书中,其载:“邑姜为十乱(治也)之一,齐太公望女,唐叔虞母。叔虞之封唐也,亦发梦于其母,故今晋水源有女郎祠,实邑姜之庙”。从此圣母殿的主像圣母有了真实的身份,是西周时姜太公之女、武王之后、成王和叔虞的母亲邑姜。自金、元之后的数百年来,一直把圣母当作水神的误传随着阎老先生的发现和考证而真相大白了。史载邑姜“贤于内治,明胎教之道,有妊,立不跛,坐不差,笑不喧,独处不倨,虽怒不詈。”(图三)周武王曾说:周代的治乱之臣,其德才兼备的不过十人。所以孔子慨叹地说:“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胜。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所谓十人中有一妇人,就指邑姜。按古代社会的礼制,母以子贵,妻以夫荣,所以后人在叔虞祠内,为其母邑姜立祠,一并奉祀,也属理所应当的。

二、“显灵昭济圣母”的封号

华带牌“显灵昭济圣母”封号,史籍记载较多。《山西通志》载:“晋源神祠,在太原县西南十里晋祠内……熙宁中守臣请号显灵昭济圣母,庙额曰惠远。”道光版《太原县志》载:“晋源神祠在晋祠,祀叔虞之母邑姜,……熙宁中以祷雨应,加号昭济圣母。”清刘大鹏《晋祠志》^[6]中载:宋宣和五年(1123年),姜仲谦《晋祠谢雨碑文》载:“女郎祠之建实始于天圣,而封号则自熙宁祷应始……。”刘永德著《晋祠风光》写道:“关于圣母殿附饰文物,如前廊所悬‘显灵昭济圣母’巨型立匾,据山西通志关于封号的记载,当是宋‘熙宁中守臣请号’奉敕批准所制的原物”。另外,晋祠现存碑碣和铁制铭文上也有记载。晋祠金人台西北



图五 华带牌“献殿”

隅宋绍圣五年(1098年)铁人胸前铭文:“献上昭济圣母,永充供养”(图四);元至元四年(1267年)弋穀所撰《重修汾东王庙记》碑文载“熙宁中始加昭济圣母号”(现存晋祠唐叔祠碑廊)。

检索以上史籍文献和碑碣资料可知:一、“熙宁中以祷雨应,加号昭济圣母”;二、“熙宁中守臣请号奉敕批准所制的原物”。以上第一点基本认为是熙宁中加封号;关于第二点,我们从宋绍圣五年(1098年)铁人胸前的铭文:“献上昭济圣母,永充供养”10个字,可知熙宁十年(1077年)封号之后,经过21年到了公元1098年仍称“昭济圣母”,并未加“显灵”二字,说明牌匾并非是“熙宁中守臣请号奉敕批准所制的原物”。最近笔者查阅到《宋会要辑稿》卷一也有记载,而且记载的年代较为确切:“神宗熙宁十年封‘昭济圣母’……徽宗政和元年加封‘显灵昭济圣母’”这一记载证实又确切了华带牌“显灵昭济圣母”始封和加封的年代,也说明了牌匾至少是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加封号后的产物。综上所述,“显灵昭济圣母”封号年代是毋庸置疑的,至于牌匾是否为宋代同时期的原物呢?仍然是笔者思索的问题。

三、宋代牌匾的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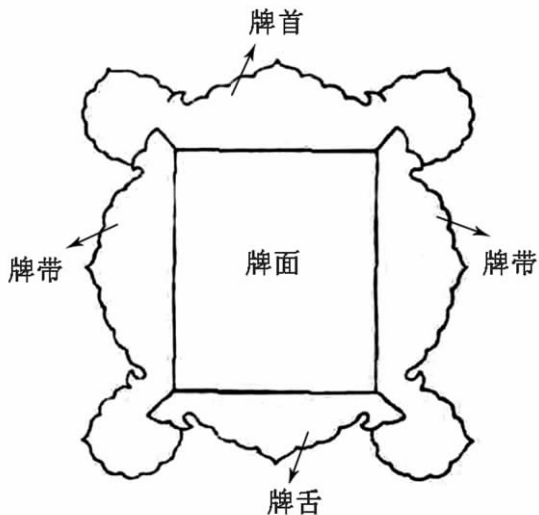
除了史籍中记载华带牌“显灵昭济圣母”为宋政和元年(1111年)加封的尊号之外,对于牌匾时代问题,既没有任何落款题记,也没有碑碣

石刻记载来证明,那么,笔者就从其牌匾的形式特点上来作为旁证借鉴。

匾额又称扁额,《说文解字》释:匾“扁,署也……署门户之文也。”而“额”字,《说文解字》作“额”字,即是悬于门屏上的牌匾,即在门户之上(额)题书,以作记。

匾额大多以长方形为主,基本形式有横匾和竖匾。横悬者,称其为匾;竖立者,谓之额。早期的匾额以竖匾为多,有长方形的,也有近于正方形的,晚期的匾额为横式,基本上是横长方形。这种形式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我国古代建筑的结构变化决定的。古代建筑大木结构特征之一的斗拱,它位于房檐之下,撑托着屋檐,显示其建筑的高大雄伟。唐宋时期的斗拱结构非常粗壮,在建筑物上占有很大的比例;元、明、清之后,斗拱的结构比例逐渐缩小,变得精巧华丽。匾额大都悬挂在建筑物房檐之下的,所以早期的建筑上大多悬挂竖额,而后期的建筑上挂横匾就比较合适了。祠内现保存悬挂有竖匾(华带牌)8方,基本上都是悬挂在北齐、宋、金等早期建筑上(图五)。

竖匾因形如称量谷物的“斗”,名为“斗匾”,也称额或称华带牌。宋代有关匾额形制的文献记载不多,北宋李诫^[7]《营造法式》中记载了二种匾额形式,即华带牌和风字牌。其中对华带牌的制作方法有较为详细的记载:“造殿堂阁门亭等牌(扁)之制,长二尺至八尺。其牌首(牌上横出者),牌带(牌两旁下垂者),牌舌(牌面下两带之内横施



图六 宋代华带牌形式



图七 《显灵昭济圣母》字体局部

者)……牌面每长一尺,则广八寸,其下又加一分,^[8]由此可见华带牌是由一块平板(匾心,宋称牌面)周围加4块斜板(宋称牌首、牌带、牌舌)组成(图六),一般竖立悬挂,常用于殿宇、坛庙与城门,形状端庄肃穆,是等级秩序的象征。

综合早期建筑上牌匾的形式特点,对比北宋李诫《营造法式》记载华带牌形式特点,“显灵昭济圣母”牌匾在形式特征上和文献上记载的宋代华带牌形式基本相似。

四、从牌匾的书法艺术上来看

“榜书”是我国古代的应用书体之一,是专指大型匾额字体的书写技法,其用笔习惯、字体结与布局都不同于常规,它最早源自秦书八体之一的“署书”,又称“榜书”。自秦汉李斯、萧何开始,历朝历代均有榜书大家,至清代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理论。榜书有两个比较显著的特点:一是字径比较大,二是适于刀刻上石。这两大特点决定了它点画粗壮雄浑、笔路清晰,同时精于点画布白、粗中有细。华带牌“显灵昭济圣母”榜书,六个贴金大字具有雄浑、博大、凝重、挺拔的气势,魅力无穷,充分体现出宋代书法讲究意境、将榜书艺术融入其韵、法、意、形、神、气的特点,同时展现出笔韵点划贯通天地精神之气魄,烘托出殿宇祠堂的恢宏气势(图七)。牌匾边饰白云花边,也显系北宋流行纹饰。

综合上述,笔者从圣母殿的建筑年代、华带牌“显灵昭济圣母”封号年代、史书记载宋式华带牌形式特征和宋代榜书艺术及风格特点等几方面,并结合“显灵昭济圣母”牌匾尊号题字、匾式

形状、花纹边饰、字迹书体对照分析,对其时代问题有了较为清晰的线索。“显灵昭济圣母”尊号是经皇帝赐封的,朝廷敕命不可违,悬匾应在封号之后,即华带牌“显灵昭济圣母”是在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加封号时的原物。

[1] 原碑已佚失,碑文收录在明嘉靖版《太原县志》中。

[2] 《宋会要辑稿》卷一。

[3] 明洪武二年《封圣母诰碑》,保存在晋祠圣母殿碑廊。

[4] 阎若璩(1638~1704),字百诗,号潜丘,山西太原人。侨居江苏淮安府山阳县。清初著名学者,考据大师,清代汉学(或考据学)发轫之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四书释地》。

[5] 《晋祠谢雨文》碑,姜仲谦撰,现存晋祠唐叔虞祠东碑廊。姜仲谦(生卒年不详),字光彦,号松庵,淄州(今山东淄博)人,曾知济南府、两浙转运使、湖北转运使。

[6] 刘大鹏(1857~1942),字友凤,号卧虎山人,别署梦醒子,又号潜园居士,山西太原县赤桥村人。是著名的地方史学者、地方文化学家。著有《晋祠志》、《晋水志》等地方志。其《退退斋日记》二百多册,记述了近现代中国和晋祠发生的重大变迁。

[7] 李诫(生卒年不详),北宋晚期负责主持工程建筑的官员,在京城(开封)任少监。任职期间,亲自主持参与过大量的土木工程建设实践,积累有丰富的建筑经验。同时,又博览群书,与工匠一齐探讨建筑科学,集中了历代建筑工匠的经验和智慧,前后用了约三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营造法式》这部建筑学巨著。

[8] 李诫《营造法式》一,卷八,164页,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

(作者系晋祠研究所副研究馆员)